

張伯苓與南開大學

吳大猷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三位名流創辦南開

南開大學是天津嚴範孫、范源濂、張伯苓所創的一個私立大學；民國八年成立時約有學生一百人，到民國十二年第一屆畢業生祇有廿一人；到民國廿六年抗戰前夕，第十五屆畢業生六十餘人，學生總數亦祇四百廿餘人，所以它是一個很小的大學。開辦時由社會人士捐助八萬元；李純的遺囑捐基金五十萬元（實收到十萬元），他的理科得袁述之氏捐七萬元，美國羅氏基金會先後捐十四萬五千元；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捐十六萬五千元；民國十年至十四年得李組紳氏捐辦礦科款十五萬元；圖書館得盧木齋氏捐十萬元，書二萬冊；李典臣氏贈藏中文典籍七百冊。這差不多是南開大學首十餘年全部所得。

校舍由開辦時在南開中學旁的一座小樓，至民國十三年遷入在八里臺由捐、購、租的地七百餘畝，在抗戰前夕的大建築思源堂（科學館）、秀山堂、芝琴樓、木齋圖書館、男生二宿舍樓等，南開的經費，校宿費為一主要來源，學費每年六十元，宿費兩學期三十元，這與國立大學（如北

大）之學費每年約十元較，自是很高的，但與教會大學（如燕京、嶺南等）比較，則是「平民」化的了。這樣的學宿費，四百個學生所繳的學宿費，祇够十來個教授的薪金，筆者沒有該時教授的總數的資據，估計或四十餘人。學校的經費是如何籌措來的，不甚清楚，可能得助於中基會給予理科的補助（見上文）。在抗戰前，國內（北平、上海）有許多的私立大學，是藉學生的學費維持的（如北平的民國大學，容納投考國立大學落榜的學生，人數頗大。）南開雖經費困難，但從來未作多收學生之意。

南開學校大師雲集

南開於民國八年至十八年期中，學生由數百人至二、三百人，設有文、理、商三「科」（民國十年至十五年間曾設礦科），各科有各部門的教授及課程（但不分「系」），例如理科有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四部門。（民國十八年遼東教育部令，始將「科」改為「院」。）每「系」教授祇有二至三人，助教一至三人，學生三數人至十餘人不等。每位教授授課三至四門；每二年將課程輪調

，使二、三年級同習某些課，三、四年級同習某些課。每一課程上課時間部分排在星期一、三、五，或二、四、六。教學的讀參考書及習題要求均甚嚴，例如每一數學課，必有習題；星期一課的習題，學生務須於星期三的課前交卷，而教授則必於該星期五課時（由助教）閱畢發還，餘類推。物理課程的實驗，皆須作詳細的報告。這樣的訓練，學生當時從未以為苦，後來且多感念。

民國八年南開大學創立時，國內已有大學多所，其最著者如北京有北京大學及後師範大學的前身「高師」；天津之北洋大學；南京之中央大學的前身東南高師；唐山及上海之交通大學；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等，南開以無何財力的私立學校而思與這些學校爭一席之地，若不是張校長對教育的信心，是不敢嘗試的。

張校長先聘南開中學早年的學生，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凌水為大學主任，施即在美聘梅光迪、余日宣、司徒如坤（文科），李道南、史澤宣、孫壘（商科），邱宗岳（化學），應尚德（生物），姜立夫（數學），饒毓泰（物理），司徒月蘭（英文），蔣廷黻（歷史），薛桂輪（礦

），李濟（人類學），楊石先（化學），徐謨（政治）等諸教授；就筆者記憶所及，隨聘蕭公權（政治），黃鈺生（心理），何廉（經濟統計），湯用彤（哲學），陳禮（物理），徐允鍾（化學），蕭謙（經濟），李繼侗（生物），錢寶琮（數學），唐文愷（商），馮柳澍（哲學），張忠欽（政治），劉晉年（數學），張克忠（化學），段茂瀾（德、法文）；稍後有熊大仕（生物），張洪沅（化工），方顯庭（經濟），陳序經、李卓敏、陳振漢、吳大業（經濟），謝明山（化工）等多人。這些人中，有在校時即是極優異的教授，更有許多後來在學術上成「大師」的，在社會上成大名的。茲舉一例。

在南開大學創始初年，邱宗岳師講授化學課時，適美國羅氏基金會某君來參觀，聽邱師講課，驚贊不已，該基金會旋捐十萬元為建科學館之用，又二萬五千元為購置設備之用。民國十三年八里臺新校址之科學館（思源堂）落成，該基金會復贈一美籍物理教授來校，協助建立物理實驗室。理科承邱、姜、饒、陳、應、徐、楊諸師的經營，建立甚高之課程水準，乃先後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補助十六萬五千元。各科教學儀器設備及外國期刊，該時或僅次於清華而已。

抗戰時期學術重心

南開大學的規模，已如上述，但享有的聲譽，却與它的規模不成比例。蘆溝橋事起，政府（教育部）即決首將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及南開大學南遷至長沙（北平其他大學遷陝之城固等處）

。以學校的歷史、規模、師資陣容、在社會上的聲望言，南開實不能與北大清華比擬；政府的重視南開，是由於什麼考慮呢？無疑的，我以為是它的教授和課程的高水準。它在早期的十數年中，畢業生之於學術、事業有成，聞名於社會的，就記憶所及，有張平羣（外交），張克忠（化工）、鄭莖厚（化學）、鄭通和（教育），張效圖（財經），查良鑑（法律），汪峯（外交），劉晉年，江澤涵，申又振（數學），宋作楠（會計），殷宏章（生物），吳大猷（物理），崔書琴、成逢一（政治）、陳省身，吳大任（數學），吳大業（經濟）等。上節所述的教師陣容和這些學生，是南開聲譽之所由來也。

民國廿六年蘆溝橋事起，七月廿九日日機對南開大學作低空轟炸，除思源堂及教員住宅（平房）外，其它建築物皆夷為平地，兩大荷花池及水道，後皆為敵偽以土填平，誠偉大的工程也。初，民國十六年，張校長感到日本覬覦我東北日亟，於赴東北四省視察後，回校組「東北研究會」，由教授組團赴東北調查實況，搜集資據。此事深招人仇視，故日人佔據天津後，即圖將他們視為「抗日中心」之「南開」，從地皮上完全的「滅跡」。張校長甚有遠見，先於民國廿五年在重慶沙坪壩建一南開中學分校，稱「南渝中學」。及抗戰軍興，南開大學奉教育部令，與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集遷長沙，旋遷昆明，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，為抗戰期中我國學術重心之一。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，卅五年南開大學在天津八里臺復校，改為國立，是年春我返校一遊，

除思源堂仍在外，只有敵偽後建一樓，黃土荒涼，昔日之水木樓館，均蕩然無存。近年中共將南開大加擴充，然抗戰前經營十八載的「南開大學」，已不可復存矣。

大中小學三千弟子

筆者自十四歲至廿四歲在南開中學、大學至任教的十年，是性格、習慣的成形，求學基礎的訓練的重要時期，現在回溯這段時期，情感的因素，自所難免，但近年來目睹臺灣的大學情形，有時不由自主的作些和自己所受的教育情形的比較，現在試着以隔了六、七十年時間距離，儘可能的撇開情感的因素，客觀的看看南開和張伯苓校長。

一、「南開」起自一八九八年，天津嚴範孫（一八六〇—一九二九年）氏聘張伯苓（一八七六—一九五一年）氏為家庭教師，經一九〇四年的改名「私立中學堂」，「敬華中學堂」，「私立第一中學堂」，至一九〇八年改稱南開中學，至一九一一年學生增至五百人；一九一七年學生增至一千人。南開大學創辦於一九一九年，南開女中部始於一九二三年。至此，全部學生達二千人。一九二八年增設小學部。一九三二年，全校學生達三千人。一九三六年，設分校「南渝中學」於重慶沙坪壩，一九三八年更名「南開中學」，學生增至一千五百人。

上述的學生人數數字，按目前臺灣學校的以萬數計者，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在抗戰前的大陸，南開中學是屬於「大型」的了。一個孩子在南開中

中學，一年的學、宿、膳、書籍、衣物所需，至少是二百五十元，在大學則至少三百元。這不是農村家庭所易負擔的，但這比教會大學如燕京、嶺南大學等的費用則又低得多了。南開學生的家庭，連帶着學生自身，是樸實型的多。這，加上南開中學的著重嚴格的管理，大學的著重學業，和學校一般的「保守」風氣，乃反映於南開學生在社會的表現——在學術、技術、公務工作上者多，在政治上的少。

二、南開大學在學術上的成就，或可由下舉事例見之。民國三十七年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，首由各大學校院、專門學會、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，分科提名候選人，約四百餘人，繼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，最後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。此八十一人中有南開師生九人，姜立夫（數學），陳省身（數學），吳大猷（物理），饒毓泰（物理），殷宏章（生物），湯用彤（哲學），李濟（人類考古），蕭公權（政治），陶孟和（社會）。後在臺灣，更有南開師生被選為院士者有蔣廷黻（歷史），何廉（經濟），錢思亮（化學），梅貽琦（教育）四人。聯合報王震邦先生曾指出，中央研究院六任的院長，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人云。

動盪之中安定成長

上舉之饒、湯、李、蕭、蔣數人，皆先在南開大學任教而後為他校所羅致的。這更表示一極重要點，即南開在聲望、規模、待遇不如其它大學的情形下，藉伯樂識才之能，聘得年輕學者，予

以研教環境，使其繼續成長，卒有大成，這是較一所學校藉已建立之聲望、設備及高薪延聘已有聲望的人為「難能可貴」得多了。前者是培育人才，後者是延攬現成的人才。我以為一個優良的大學，其必需條件之一，自然係優良的學者教師，但更高一層的理想，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，使其發展他的才能。從這觀點看，南開大學實有極高的成就。前第二節所略舉的教授，聘來時多初由外返國，然不數年即以教導後學，或從事研究，蔚成大師者，如邱、姜、饒、蔣、楊、蕭、何、湯、李、張等（就早年的教授言）。蕭公權一代政治學家，湯用彤佛學大師；何廉可能是在國內引入市場指數調查者，後在南開辦經濟研究所；蔣廷黻在南開以領先研究我國（鴉片煙事始）外交史聞名；李繼侗在國內實驗研究未昌時，在南開從事植物的光合作用。這些位都是曾在南開成長的。

三、民國十八年，南開大學十周年，正值盛年。時清華大學成立了四年，在其積極發展中，由南開聘去蔣廷黻、蕭蓬、李繼侗三人。同年饒毓泰師得中基會研究獎金赴德；陳禮師就工業工程師職；蕭公權、湯用彤亦就校聘。初，在北洋政府期間，內戰外侮頻繁，北平學生運動風氣甚盛，北京大學且有欠薪若干個月或祇發薪數成之事。南開從不欠薪，又偏處天津郊外，受政治、戰爭的影響較輕，故能在動盪環境中維持其學術安定成長。

及國民政府成立，社會大定，國立的大學如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中央大學等皆有改進發展

，在學校規模、經費上，皆強於南開。又民國十七年多，張校長赴美，翌年秋始返校，微聞十八年春在校長離校期間，校方在調整薪金上略有不同，引致不愉快事，為少數教授離去原因之一云云。此可以道聽途說視之，但南開大學則確有如遭大劫之感。

一個大學之解聘不勝任的教授，和延聘優異教授，同樣的重要，真理甚明，無需申述。南開之解聘人員，皆在學年結束前知照當事者，俾得早作新職洽商。該時各校解聘方式皆略同；從來未聞有抗議或訴諸報章，如在臺灣的。解聘教授，自應有正當理由，但「職業保障」，不能構成反對解聘的理由。臺灣的幾乎沒有解聘教授的情形，和平頭制度，是臺灣高等學術薄弱，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。欲改善此情形，必須學術界建立較高之水準及權威，以大魄力推建評審的制度。

教育救國逾半世紀

四、「南開」是我國教育史中罕有的一個例子；它由家塾，而中學、大學、女中、小學而分校，好像一個大家族，家長祇有一個人——張伯苓。我們有幾個著名的大學，亦有許些大名的教育家；比如北京大學，它有過蔡元培、蔣夢麟、胡適校長，但他們中任一人都不「代表」。「北大」，如「張伯苓」之「代表」南開然。張氏不僅是創辦整個南開；他堅守「教育救國」的目的，全部獻身於學校五十多年；我們可以說，南開的師生對社會、學術的貢獻，間接的都是來自張校長。張校長的小傳、年譜，和學生、朋友們對他的

懷念，可以參讀「國立南開大學」一書（南京出版有限公司，民國七十年版。）我在這裏祇說一點實而不華的話。

張校長是在早歲即有一個明晰目的，即是終生從事教育，救甲午之戰揭露出的弱國。他雖然在哥倫比亞大學隨杜威學教育，但他從未以教育家自居；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實行者，從來不說空泛的話；他對校務，完全賴幾位忠心耿耿的同仁；南開的財務為華午晴；南開中學的教務為喻慶澗；南開中學的庶務為孟琴襄；南開大學的註冊事及機要秘書為仇乃如；大學教授的延邀，最早期委之於凌冰，後乃由各院系的推薦。

教務方面的事，早期（國民政府成立前）政府似未有劃一的規定制度，課程及畢業所需學分等，皆由學校自行制定。在南開，每學期註冊時，註冊組印就由各院系擬定必修、預修、選修的

課程及授課時間。南開的教授，絕無兼任兼課的；學生除球隊及運動會外，甚少如目前臺灣的所謂社團活動。學校無「訓導」或軍事教座，亦從未有學生與校方爭執或對抗之事。

簡樸作風月薪百元

校風簡樸安寧，原因之一，乃教師學生人數不大，偏頗之見，不易滋長也。另一原因，乃來自張校長。校長不大問校內事，蓋他勞心的是為學校籌款。又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前，平津乃戰爭頻仍之地，應付當權軍政首長，殊費心力也。偶有學生問題，則多化解。校長的堅定信念、經歷和人格，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尊嚴，在學生面前呈現的是一個魁梧的身軀，嚴肅而帶慈祥的臉色，許多問題都自然的化解了。

校長從無籍教育以進身仕祿之思，家庭度一

極簡樸的生活，奔走南開中學與八里臺南大，一人力車而已。在南開祇支象徵性的月薪約百元，蓋有天津電車公司致送的「董事」月薪三百元也。抗戰事起，南開中學之能到後方者，納入重慶沙坪壩之南渝中學；大學師生則由長沙至昆明，併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，張校長感於蔣委員長的號召，任國民參政會議的副議長，抗戰勝利後，民國卅七年，先總統蔣公提任張校長為考試院院長。時國共戰事日逼，校長體力漸衰，翌年辭考試院院長職，以病未能來臺，旋於四十年腦溢血，逝於天津，享壽七十六。

一九七九年南開大學六十周年，大陸南開大學出一小紀念冊，竟無張伯苓名字；一九八六年之南開大學簡介小冊，張伯苓之名及小照始復現，是張氏創辦南開及他的功績，即中共亦不能抑沒也。

中外文庫 之三十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
上、下冊合售新臺幣一八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、高劍父、屈大均、羅文幹、吳鐵城、陳公博、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附有珍貴圖照，美不勝收。上下合訂一冊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